



《黄亭子札记》

从历史中走来（上）

王凤生

夏衍同志上个世纪80年代与电影学院师生座谈时曾说过，中国电影先天不足。他指的是在二、三十年代，中国有戏剧、美术、音乐学校，唯独没有电影学校，他们那些人搞电影，都是“半路出家”。

一直到1950年6月，我国才有了第一所电影学校，那就是今天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电影表演艺术研究所。它隶属文化部电影局，坐落在北京西城区石老娘胡同（西四北五条），所长陈波儿。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办起来的第一所培养电影人才的学校。1951年6月，表演艺术研究所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电影学校”。1953年11月再次更名为“北京电影学校”。1956年6月1日，国务院批准北京电影学校改制为“北京电影学院”，设置导演、演员、摄影、美术、录音、电影经济等6个四年学制的本科专业和五年制的电影学专业，以及二年制的放映师范专修科。王阑西

为首任院长。

研究电影学院的历史自然离不开中国电影的历史。上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开展起来的“左翼电影运动”和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关注、领导电影事业的两个重要时期。正是在这两个时期培养和造就了北京电影学院初创时期的领导与教师队伍。



陈波儿

1929年9月党领导的“艺术剧社”成立。1933年3月，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讨论决定，并经瞿秋白同志同意，成立了夏衍为组长，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惠敏为成员的党的电影小组。在电影小组领导下的左翼电影运动的新阵地——上海“电通制片公司”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拍出了《桃李劫》、《风



黎莉莉出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剧照



吴印咸为毛泽东拍照（1945年于延安）

云儿女》等进步影片。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风云儿女》的主题歌。

由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辑、于1993年9月出版的《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一书，一开篇便是“左翼电影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和主要创作人员”的头像照，共47人。其中就有后来参与创建电影学院的4人：陈波儿（演员）、黎莉莉（演员）、吴印咸（摄影师）、杨霁明（摄影师）。据我的统计（或许是不完全的），在左翼戏剧电影时期，电影学院建院初期的领导与教师就有13人参加。他们是：吴印咸、陈波儿、赵明、杨霁明、黎莉莉、钟敬之、王阑西、章泯、魏曼青、成洁、许之乔、张容、邱力（北平左联）。在我到电影学院工作后，我有幸

接触到了他们当中的7位。但时至今日，他们也都相继离开了我们这个世界。

陈波儿，1910年生于广东汕头，1929年参加上海左翼戏剧运动后转入左翼电影，1938年到延安，1950年任表演艺术研究所所长，1951年去世。在当年11月3日的追悼会上，胡乔木等同志到会并讲话。邓颖超同志在悼念她的文章中，称她是“一个优秀的电影艺术工作者”，周扬赞颂她“经历了大时代的风浪，始终勇敢地走在前进的行列”。

1991年9月，我到电影学院工作。春节期间去教工家拜年，看望尚健在的老同志。1992年1月31日，我和郝维平副书记、冯文斌同志去看望左翼电影时期与延安时期的黎莉莉、邱力和干学伟同志。那一年黎莉莉已是77岁高龄的老人，但看上去



吴印咸（1942年摄于延安）

却很有精气神，身体硬朗。她和她的老伴，著名画家艾中信很高兴地迎接我们。那一次她送给我一份复印材料，是关于她父亲的，作者周文琪，标题《战斗在敌人心脏的钱壮飞同志》。

钱壮飞，原名钱壮秋，是忠诚的中共党员，1927年11月，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来到上海创建隐蔽斗争中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委（亦称特科）。1929年2月，中央正式决定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由于他们的机智、勇敢，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成功地保卫了党中央、党的组织，免遭由于叛徒出卖而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后来周恩来称赞他们三人为在白区对敌斗争的“龙潭三杰”。

黎莉莉，原名钱蓁蓁，生于1915年7月13日。由于父母亲都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没有办法照顾她，把十几岁的她送进中华歌舞团，南洋演出后歌舞团解散，她无家可归，团长黎锦晖带着她住在新加坡，



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南海会见电影届女演员。周恩来与邓颖超中间的是黎莉莉

新国法律规定一家不能有两姓，她就改姓黎，取名黎明莉。1931年到南京演出，改叫黎莉莉。

1930年4月中旬，清华召开联欢会，她和王人美作为黎锦晖新成立的“明月歌舞团”的成员来清华大学礼堂演出《三蝴蝶》，她记叙那一次演出，“礼堂里座无虚席”，“千人的剧场鸦雀无声，闭幕时掌声如雷，谢幕多次方罢”，“气氛的热烈达到疯狂的程度”。

她积极参加左翼电影运动，1931年，1932年参加上海“联华”、“天一”影业公司，作为演员拍摄了《小玩意》、《大路》、《狼山喋血记》、《联华交响曲》等号召民众团结向前、反帝的进步影片。成为三十年代最受观众喜爱的女影星之一。抗战爆发后，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主演了歌颂民族团结抗战的影片《塞上风

云》。

1955年，她从北京电影制片厂来到北京电影学校表演干部进修班学习，结束后留校任教。成为表演系的一名教师。2005年8月7日去世，享年90岁。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48年3月28日，党中央机关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先后13年。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进驻延安，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毛泽东在延安整整10年。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这篇讲话成了自那以后我国发展文化艺术事业的指针。

延安时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北京电影学院初创时期的领

导、骨干和教师。他们是：吴印咸、陈波儿、白大方、钟敬之、罗光达、成荫、鲁明、邸力、张昕、孙铮、欧阳儒秋、干学伟、吴国英、高锦夫、李牧、成洁等，共16位。在我到电影学院工作后，我有幸接触到他们中的10位。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直接聆听毛泽东《讲话》的有4位：吴印咸（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团长）、陈波儿（中共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研究员）、钟敬之（实验剧团团务委员会主任）和干学伟（实验剧团团务委员会委员及戏剧系教师）。

1992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5月13日，学院召开了有全院教职工参加的纪念《讲话》的座谈会。请干学伟、罗光达、邸力、欧阳儒秋、高锦夫等老同志参加，他们以亲身经历讲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况，以及他们当时是怎样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从事文艺活动的。我在会上强调了纪念《讲话》的现实意义，一定要继续传承、发扬光大学院的这一光荣传统，宣传、贯彻《讲话》精神，加强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艺术观和毛泽东艺术思想的教育。

那一天的座谈会，有一位因事未能到会，但他无论是在左翼戏剧电影时期，还是在延安时期，以及在电影学院的创建、发展中都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那就是吴印咸同志。

吴印咸，原名吴荫诚，1900年9月生，1994年9月7日去世，享年94岁。他一生从



吴印咸与王凤生（1993年10月）

事摄影事业。上世纪30年代，他积极参与上海左翼电影事业，诞生了国歌的影片《风云儿女》就是由他作为摄影师拍摄的第一部影片。还是在1935年，他拍摄了由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成为他在30年代的代表作。在他自传式的文章《影艺六十年》（登载于《人物》杂志1986年第5期）中写道：“此时，我已是左翼电影界的坚定分子了。”

1938年，他毅然从上海奔赴抗日前线，革命圣地延安。1942年，他担任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团长。八路军电影团拥有的第一台摄影机，是经他的手从外国友人手里接过来的。《影艺六十年》记叙了事情的经过。

在他去延安路经汉口时，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告诉他们，

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 1898-1989）决定送给八路军一台“埃姆”35毫米摄影机。原本伊文思打算去延安拍摄，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百般阻挠不得成行，在他得知吴印咸他们准备去延安拍片子时，便决定赠送摄影机。

“在一个星光暗淡的夜晚，我乘坐周恩来同志的汽车来到汉口郊外一条马路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为国民党当局严格禁止的活动，心情难免有些紧张。一会儿，另一辆汽车驶来，从车上下来一位外国人，他就是伊文思。他将摄影机和二千英尺电影负片交给我，并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我无法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

谢和敬意。在夜幕中，我们匆匆分手，竟都没有看清对方的面容。当我们在1957年再次见面时，我们彼此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在明媚的阳光下，我们仔细端详着对方，回想起初次见面的情景，心中有无限的感慨与快慰。”

吴印咸用这台摄影机在南泥湾拍摄了延安军民大生产运动的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他请毛主席在片子里出现，那个镜头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主席在铺好的白纸上挥笔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刚劲有力的大字的情形。“拍摄工作结束后，他（指毛主席）对我说：‘我的这张题词就送给你吧！’”用这台摄影机，吴印咸将中共七大会议全部记录下来，那是我们党历届代表大会第一部完整的文献资料。📷